

周作人正传

钱理群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周作人正传

钱理群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作人正传 / 钱理群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 1
(名家正传丛书)

ISBN 978-7-5399-3130-2

I. 周… II. 钱… III. 周作人(1885~1967)—传记
IV.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4562 号

书 名 周作人正传
著 者 钱理群
主 编 金宏达 于 青
责任编辑 杨 倩
责任校对 陈 茹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160 千
印 张 6.625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130-2
定 价 16.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小 引

这套书,特别要说明的,是“正传”二字。

鲁迅先生当年为《阿 Q 正传》题名之时,颇费斟酌,各传名目繁多,皆不好用,最后,便从“闲话休题,言归正传”中提取“正传”二字,用于阿 Q,类乎戏笔。

其实,“正传”实很必需,在一个“戏说”盛行的时代。我们的“名家正传”,便是廓除“戏说”,本于信实,由有研究功力的作者以简赅之文辞,诚恳之态度,状名家之风貌,留历史之真迹。

其先,或已有更宏博厚重的评述,现在的本子,则是较扼要的一种,原因无他,乃是景观太多,时间有限,必得偏劳内行的人士,设计了最佳的路线,逐一指引给我们看。

当然我们期待,借此路径,让更多的名家,走近更多的读者。

主编 启

目录

- 1 第一章 历史的进退之向——在北平（一）
 （1917年4月—1927年10月）
- 63 第二章 苦雨斋里的老人——在北平（二）
 （1927年11月—1937年7月）
- 103 第三章 走向深渊——在北平（三）
 （1937年7月—1945年12月）
- 143 第四章 老虎桥边——在北平、南京
 （1945年12月—1949年1月）
- 155 第五章 人生最后一程——在上海、北京
 （1949年1月—1967年5月）

第一章 历史的进退之向 ——在北平（一）

（1917年4月—1927年10月）

一、时代的弄潮儿

1917年3月27日，32岁的周作人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离家北上。这一日，正是曾任江南水师学堂管轮监督的叔祖椒生公的“五七”祭日，周作人是因他之力而逃出家乡，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了五年书（1901年8月—1906年6月），以后又远游日本，在那里寻得了“第二故乡”（1906年6月—1911年秋）。周作人从绍兴出发——先乘船去宁波，目的是看望从小在一起的伯升叔。此次叔侄相见，回顾当年在三味书屋读书、嬉戏的情景，自不免一番唏嘘，不料竟成永诀——几年后，伯升叔在宁波病逝，年仅37岁。事后回想起来，周作人才意识到，与童年时代、南京求学时期关系密切的伯升叔、椒生公恰于此时“过去”，似乎在表示时间的一个段落：人生旅途的准备时期终于结束，由此开始了独立的人生之路。这次北行，恰是一个大转折。

这确实是一个关键时刻。此时（1917年）历史几经挣扎，终

于走出辛亥革命失败后的低谷，新的革命高潮的准备阶段——新文化运动正勃然兴起。周作人由东南一隅的绍兴来到下一个历史潮流发源地北京，这正是一个不失时机的“转移”。周作人到北京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开设欧洲文学史与罗马文学史等课程，并兼任国史编纂处纂辑员，很快就成为著名的“卯字号的名人”^[1]，在这里结识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等一大批“新派”人物，并与其兄鲁迅（周树人）一起，成为《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以及稍后的《小说月报》等新文化运动主要阵地的骨干。周作人最初是以翻译家的身份出现在“五四”文坛上的。他翻译的小说后来集为《点滴》一书，大力介绍俄国和波兰、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当时就被誉为是“开新纪元”的工作。周作人翻译的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第一次宣布了以“没有爱情”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婚姻的不道德性，确立了“结婚与离婚自由”的原则，胡适称之为：“东方文明史上一件极可贺的事”，也写了《贞操论》，以为声援，又引出了鲁迅《我之节烈观》一篇煌煌大文，这是新文化战线上一次非常漂亮的联合作战。

真正确立了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地位的，是他在理论上的贡献。1918年12月，不到一个月，周作人就写出了《人的文学》、《论黑幕》与《平民文学》三篇重要论文^[2]，可见周作人早已胸有成竹，呼之欲出。这自然使陈独秀等大为振奋，陈独秀连忙写信给周作人，力赞“大著《人的文学》做得极好”^[3]。《新青年》与《每周评论》也以最快的速度，在显著位置上发表了周作人的这几篇力作^[4]。文章一出，不仅立即轰动当时的文坛，而且到1935年胡适还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里，称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胡适认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

都可以包括在“两个中心思想”的里面，“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他强调周作人这篇“最平实伟大的宣言”，“他的详细节目，至今还值得细读”。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以及以后陆续写出的《思想革命》（载1919年3月2日《每周评论》11期）、《新文学的要求》（载1920年1月8日《晨报副刊》）、《圣书与中国文学》（载1921年1月10日《小说月报》12卷1号）等文，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是最能显示“五四”时期周作人的思想特色的，并且是“五四”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的重要理论建树，现在已经成为历史性文献了。

周作人在《思想革命》一文中明确提出，“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这是他对辛亥革命，特别是张勋复辟事件历史经验的基本总结。以此为出发点，周作人把“五四”“人”的发现与文学的发现统一起来，把“五四”思想革命精神灌输到文学革命中去，在“人”的历史焦点上，找到了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契合点。周作人在《人的文学》里特地强调，“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这不仅显示了周作人自身着重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去探讨社会、人生、人性的特点，而且因此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两大旗帜互相联结起来。在此基础上，他建立起了一个“人学”理论构架。

周作人的“人学”结构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自然人性论”，既强调“人是一种动物”，又是“进化的动物”；因此，“人”具有“肉”与“灵”二重性，即“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其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具有精神的形而上学的“灵”的追求与改造生活的理性力量，“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5]。另一则是所谓“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即强调

“人”具有“个人与人类的两重性”，“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6]；在“人类”与“个人”的关系上，则强调“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因此，“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7]。所谓“人的文学”即是建筑在上述“人”的基本自觉基础上；周作人把它概括为两点：“一，这文学是人性的，不是兽性，也不是神性的”；“二，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8]。

这样，无论对“人”自身的认识，还是对“文学”自身的认识，周作人都试图进行根本观念的变革，这也可以说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重点所在，首先是针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的，强调“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到完全满足。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9]，强调文学“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包括他（她）们的世俗情欲”^[10]。它同时又是反对封建家庭本位主义的，强调“人”与“文学”的至高无上的“个人性”，这就使周作人的思想大大接近了本世纪初鲁迅的“个人无政府主义”。周作人对文学发展的轨迹作了这样的描述：“古代的人类的文学，变为阶级的文学；后来阶级的范围逐渐脱去，于是归结到个人的文学，也就是现代的人类的文学”^[11]，这个结论甚至是针对本世纪初周作人自己也曾经信奉的民族主义的。所要破除的，不仅是“家庭”的偶像，而且包括“种族的、国家的”，以至“乡土的”偶像，而要建立起“现代的人类”的意识^[12]，确认“人类的运命是同一的，所以我要顾虑我的运命，便同时须顾虑人类共同的运命。所以我们只能说时代，不能分中外。我们偶有创作，自然偏于见闻较确的中国一方面，其余大多数还须绍介译述外国的著作，扩大读者的

精神，眼里看见了世界的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13]。后来，周作人自己说：“五四时代我正梦想着世界主义，讲过许多迂远的话”^[14]，大概也包括《人的文学》这些文章在内吧。

周作人精心构制的“人学”结构，实际上构成了他的一种信仰。周作人在少年中国学会讲演中就公开宣称，“这新时代的文学家是偶像破坏者，但他还有他的新宗教——人道主义的理想是他的信仰，人类的意志便是他的神”^[15]。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曾对宗教与文学的关系产生浓厚的兴趣，作过专门的研究。他认为“神人合一，物我无间的体验”，“入神”、“忘我”的境地，“是文学与宗教的共通点的所在”。周作人说：“基督教艺术的内容便是使人与神合一及人们互相合一的感情”；而在他看来，文学的基本目的与功能，就是沟通人们的心灵与感情世界，因此，他十分欣赏托尔斯泰关于“艺术家的目的，是将他见了自然或人生的时候所经验的感情，传给别人”的观点，他一再地引用安特来夫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文艺观：“我们的不幸，便是在大家对于别人的心灵、生命、苦痛、习惯、意向、愿望，都很少理解，而且几乎全无。我是治文学的，我之所以觉得文学的可尊，便因其最高尚的事业，是在拭去一切的界限与距离。”^[16]这是对于文学本质的一种浪漫主义的把握^[17]。在“五四”时期，蔡元培曾提倡“以美育代宗教”，周作人并不赞同；但他对于“人”、“人的文学”、“人道主义”的信仰，确实使他这一时期的思想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色彩。周作人后来把它解释为一种“少年意气”：“一个人在某一时期大抵要成为理想派，对于文艺与人生抱着一种什么主义”^[18]，“我本来是无信仰的，不过以前还凭了少年的意气，有时候要高谈阔论地讲话”^[19]。我们也可以承认周作人的这种解释：“五四”时期原本是提倡“少年精神”的，而且因此曾经给我们这

个老大的中国，带来了新的希望。

作为“少年精神”的另一面，“五四”时期的先驱者是从不知收敛自己的锋芒的。即使是周作人，尽管有着温和的个性，尽管在他这一时期的著作中，也不时呼唤“中和”^[20]，但他仍然（至少有时是）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周作人在《人的文学》里，就相当激烈地批判与否定“非人的文学”。他一口气开列出十类“非人的文学”，并且断言“在主义上，一切都该排斥”^[21]。在他开列的应该排斥的书单上，《西游记》、《聊斋志异》、《水浒》、《笑林广记》等均赫然在目；这就是同时代的一些先驱者都是不能同意的^[22]。“五四”时期，对于中国旧戏的全盘否定，周作人也是始作俑者。在《人的文学》里，他就将旧戏列为“非人的文学”的集大成者；在此之前，他曾在与钱玄同的通信中，“论中国旧戏之应废”，断言“中国戏多含原始的宗教的分子”，“有害于世道人心”，“没有存在的价值”^[23]。后来钱玄同进一步提出遭到很多人非议的“全数封闭”论^[24]，不能不说与周作人的鼓吹有关。而周作人的《论黑幕》、《再论黑幕》及《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等文章中，对黑幕小说与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尖锐批判，更是被认为是体现了“五四”新文学的批判战斗精神的典范之作，为新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周作人正是以这些所向披靡的战斗业绩，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一个“五四战士”的形象。尽管他本人后来竭力想抹去这一形象；“所向披靡”本身大概就是周作人所厌恶的。也有人出于各种动机试图否认这一形象。这都是徒劳的。历史已经忠实地记下了这一事实：周作人曾经作为“战士”出现在“五四”新文学阵地上。

二、“小河”的忧虑

1919年2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6卷2号，以头条位置发

表了一首题为《小河》的新诗，这样的编排在《新青年》是少有的，自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人们感到兴趣的是，周作人的新诗所显示的他的内心世界的一角，那种隐隐的忧郁。当“土堰坍了，水冲着坚固的石堰，还只是乱转”，我们听见了“堰外田里的稻”，一面皱眉一面悠悠地唱道——

我是一株稻，是一株可怜的小草，
我喜欢水来润泽我，
却怕他在我身上流过。

.....

既“喜欢水来润泽我”，“却怕他在我身上流过”；既对“他在地底里呻吟”表示同情，又本能地觉得“他”的呻吟“听去虽然微细，却又如何可怕”；既希望“他”“微笑”着“稳稳的流着”，又害怕“他”“不认识从前的朋友”。粗暴地“在我身上大踏步过去”——这“稻”对于“水”，怀着多么矛盾的心情呵！这一再重复的“怕”字，流露出怎样一种难以遏制的不安与忧虑！“稻”显然是周作人的自况，那么，“水”呢？

直到25年后，周作人才在《苦茶庵打油诗》的《后记》里揭开“谜底”——

孔子曰，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吾侪小人诚不足与语仁勇，唯忧生悯乱，正是人情之常。……大抵忧惧的分子在我的诗里由来已久，最好的例子是那篇《小河》。……一句话就是那种古老的忧惧。这本是中国旧诗人的传统，不过不幸他们多是事后的哀伤，我们还算好一点的是将来的忧虑。……鄙人是东南水乡的人民，对于水很有情分，可是也十分知道水的厉害，“小河”的题材

即由此而出。古人云，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法国路易十四云，朕等死之后有洪水来。其一戒惧如周公，其一放肆如隋炀，但二者的话其归趋则一，是一样的可怕。……

周作人就这样陷入了困惑：他一面把思想启蒙——唤起人的自觉，文学的自觉，作为一种信仰，理想，热情地为之献身，一面却为其几乎是必然产生的“可怕”后果而忧惧：这是怎样的苦境呢？周作人迟早要抛去这沉重的“负担”，即使必须同时卸下那“战士”的盔甲与桂冠。

三、“新村”运动

1919年7月2日，在“五四”风暴基本平息以后，周作人又从塘沽去东京，并于8月4日携同妻子儿女回国。

周作人在日期间，最大的收获自然是他在7月7日至7月11日期间，对日本“新村”所在地石河内村的访问。

所谓“新村”，是1918年由日本著名作家、思想家武者小路实笃在九州日向建立的；这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地。后来在一篇题为《访日本新村记》的文章中，周作人这样描述初踏上“新村”所在地——位于九州东南部宫崎县的日向国——时的感受：

我自从进了日向已经很兴奋，此时更觉感动欣喜，不知怎么说才好，似乎平日梦想的世界，已经到来，……现在虽然仍在旧世界居住，但即此部分的奇迹，已能够使我信念更加坚固，相信将来必有全体成功的一日。我们常感着同胞之爱，却多未感到同类之爱；这同类之爱的理论，在我虽也常常想到，至于经验，却是初次。新村的空气中，便只充满这爱，所以令人融醉，几于忘

返，这真可谓不奇的奇迹了。

可以感到，周作人是怀着宗教般的热情到他的爱的“理想国”去朝圣的；当他置身于其间，并亲身体验到一种“人类之爱”——他曾试图赋予“日本文化”以超越国家、民族界限的“人类文化”的品格，“五四”时期，他也以“世界民”自居——，他内心的喜悦就是不可言说的；他说他“融醉”了，这真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而且这仅仅是开始——

……我在村中，虽然已没有“敝国贵邦”的应酬，但终被当作客人，加以优待，这也就是歧视；若到田间工作，便觉如在故乡园中掘地种花，他们也认为我为村中一个工人，更无区别。这种浑融的感情，要非实验不能知道；虽然还没有达到“汝即我”的境地，但因这经验，略得证明这理想的可能与实现的幸福，那又是我的极大喜悦与光荣了。

乡间的体力劳动对于一个来自喧嚣的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竟起了如此神秘的精神作用：仿佛是摆脱了一切外在束缚——身份，地位，人伦关系……等等，只作为纯粹的“人”的个体，与同样纯粹的“自然”与“他人”，自然地交往交流，周作人于是进入了“悠然陶然”的境界，这既是“超越”——超越利害，也超越世间善恶，又是“融入”——人、我、物、我的交融。这是周作人一直追求的人生境界，在现实中越无实现的可能，追求越是迫切。现在，周作人在日本新村仿佛找到了体现他理想原则的现实实体，总算有了自己的“乌托邦”。他从东京回到中国后，就成为中国新村运动最积极的鼓吹者与组织者。周作人以对他来说可谓空前的

热情与干劲，到处做报告，写文章。在所有的文章或演说中，周作人反复强调一点，即“新村的理想，简单的说一句话，是人的生活”^[25]。而所谓“人的生活”应该是一种“和谐”、“互助”与“独立”，“协力”与“自由”的调和，“人类”的“人”与“个体”的“人”的统一，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却又完全发展自己个性”^[26]；这又是“物质”与“精神”，“肉”与“灵”的“调和”，“物质的方面是安全的生活，精神的方面是自由的发展”，也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27]；这同时还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统一，“劳动”与“健康”的调和。可以看出，周作人宣布的“新村的理想”即“真正的人的生活的理想”与他这一时期所鼓吹的“人学”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却带有更加鲜明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从表面上看，这是对“五四”时代思潮的一种呼应——李大钊在著名的《庶民的胜利》的讲演里曾经断言：“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20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20世纪的群众运动……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这种世界的社会力，在人间一有动荡，世界各处都有风靡云涌，山鸣谷应的样子”，这几乎成为“五四”时期一切急进的知识分子的共同信念，以至于一时间“社会主义”成了一个“时髦的名词”。但在更深层次上，周作人提倡新村运动又恰恰出于对汹涌而至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疑惧。他在第一篇有关新村运动的文章里，引用了武者小路的一段话：“新时代应该来了。无论迟早，世界的革命，总要发生”，“对于这将来的时代，不先预备，必然要起革命，怕惧革命的人，除了努力使人渐渐实行人的生活以外，别无方法。”周作人显然于此深有共鸣，他也直言不讳地说：新村运动的好处在于，既“顺了必然的潮流”，又可免“将来的革命”^[28]。周作人在另一封通信中也说得很清楚：“新村与别的社会改造不同的地方，是想和平的得到革命的结果”，主张“缓进的革命”，寄希望于“不劳而获”

的“特殊阶级”的“翻然改悔”，而反对“翻天覆地，唯铁与血的暴力革命”^[29]。既向往“社会主义”，又畏惧“社会革命”的心理，是很能反映周作人这一类知识分子在 20 世纪历史大潮流面前的矛盾心境与处境的。

有意思的是，新村运动最坚决的支持者竟然是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从年长一辈的李大钊，到年轻一代的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等都是如此。

于是，1920 年 4 月 7 日周作人日记中出现了“毛泽东君来访”的记录。其时，毛泽东刚刚起草完建设新村的计划书，并将其中《学生之工作》一章发表于 1919 年 12 月出版的《湖南教育》月刊，趁第二次来北京之机，拜访中国新村运动的倡导人周作人，是很自然的。这是渴求真理的学生向自己尊重、信任的老师的一次例行访问，本不足怪。周作人也是按惯例写入日记，并没有引起格外的注意。

周作人所倡导的“新村运动”，在得到李大钊为首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热烈赞同时，却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受到了冷遇或反对。几乎处处都充当他的后盾的大哥鲁迅首先毫不隐讳地显示了自己的冷淡。他在写给钱玄同的信中说，周作人宣传新村运动的文章“不是什么大文章，不必各处登载”^[30]。在《头发的故事》里他更借小说主人公之口，提出了自己的质问：“改革么？武器在哪里？工读么，工厂在哪里？”“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鲁迅显然不满意于周作人对于乌托邦理想的过分沉溺，他是一直主张立足于现实的更切实的战斗的。周作人新村运动的另一个有力的反对者，是大名鼎鼎的胡适博士。胡适曾于 1920 年公开发表演说，指出周作人所鼓吹的新村主义实际上是孟子所宣扬的“穷则独善其身”的“独善的个人主义”，

“想跳出这个社会去寻找一种超出现实社会的理想生活”，“实在同山林隐逸的生活是根本相同的”^[31]。胡适的批评同样也击中了要害：在周作人急进的主张背后正隐藏着他与中国“隐逸”传统的深刻联系。另一面则也显示了胡适不同于周作人的个人气质与风格：胡适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儒家入世哲学的忠实信徒，他有着更强的社会责任感，更自觉的介入意识与政治意识，他的人生态度始终是乐观与积极的。周作人则要消极，平和，也悲观得多。周作人后来曾著文反驳，说隐士“归隐、躬耕只是他们消极的消遣”，而新村运动则是“积极的实行他们泛劳动的主义”^[32]。这不过是表示周作人在“五四”时期确无隐逸之意而已；而最终却不免要走上“那一路”的。

四、儿童的发现与歌谣的征集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在1920年我又开始——这说是开始，或者不如说是复活更是恰当，一种特殊的文学活动，这便是此处所说的儿童文学。”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研究确实是以绍兴时期为开端的，但它在“五四”时期的“复活”却别有意义——它最终完成了周作人对于“人”的研究。因此，周作人于1920年11月发表的《儿童的文学》一文与《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圣书与中国文学》^[33]一起，成为周作人“五四”所建立的“人学”的主要代表作。

这是应孔德学校之邀所作的一次讲演。据周作人介绍，孔德学校是北京大学同人开办的一所自小学至中学一贯的新式学校，以法国哲学家孔德命名，表示了一切取自由主义的教育方针。讲演是“五四”时期颇为流行的启蒙方式，我们在周作人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到××讲演”之类的记载。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这次《儿童的文学》（1920年10月26日在孔德学校讲），与